

王毅作品集《水玉小集》

今年是长征胜利80周年,军旅女作家王毅用多种文学形式弘扬伟大的长征精神,续写新的长征故事,展现了一位文艺工作者的历史使命与责任担当。多年来在军队中,王毅坚持为兵的创作导向,深深扎根于部队生活之中,用文字表达对社会和军队的深层思考。她多年创作的心血凝结为数百万字的散文、随笔、诗歌、报告文学、访谈、学术研究和数部专著。此次,王毅将其中一些作品汇编成《水玉小集》,分“我问”、“他说”、“温暖”、“兵者”、“千年”、“基因”六卷,以此向长征胜利80周年献礼。现刊发部分评论文章以飨读者。

热爱军旅文学

□莫 言

官兵,年轻官兵又不愿意进入这行业,突破这个瓶颈难度很大。

军旅作家前景怎样?诗人比作家处境似乎更加尴尬,以诗来回答这个问题。

都说写诗的人比读诗的人要多,写诗和读诗的人都越来越少了。但对于大多数人而言,遇到好的诗,写到心坎里,引起了共鸣,还是会情不自禁地看下去,在我看来,其实生活中并不缺读诗的人,缺的是能把诗写到人们心坎里的诗人。作家同样如此,需要真正了解读者的心理,才能真正走进其心里。

王毅的诗歌创作来源于生活,寥寥数语,情感真挚充沛,容易引起共鸣。像《兵者》里的“英雄”、“礼赞”篇章,用诗歌记录汶川大地震,是对部队官兵最高的礼赞,尤其是那些参与过抗震救灾的官兵一定深有同感。

军旅作家写什么?我想写真实也好,写生活也好,最终还要归结到写人上来,生活环境、社会背景都是人在其中活动的一些后台背景,作家应该时刻盯着人,描述人。军旅作家就应该盯着军队的人来写。在王

毅看来,当作家就是要像她在《光明日报》用一个版面来采写胡可那样“好生为人民服务”,追求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。而这一点,恰恰是她创作核心理念,抓住人来写,就抓住了关键。

怎样写好军队的人?作家需要对人物的深刻理解,要有阅历,要广泛接触社会,头脑里面要有形形色色的人物,然后汇合成一个典型人物。

现在对于我们这个年纪的作家来讲,一个最大困难,是对当代社会了解不太够。最近20多年我生活在北京,尽管每年拿一定时间回到我的故乡生活一段时间,但由于社会地位发生变化,变成一个所谓有身份的人,了解生活、深入生活实际上也有很大困难。

每一个时代有每一个时代的作家,我们这一代作家现在也许永远突破不了瓶颈,作家老了以后就应该认输,因为无法代替年轻人,就应该让年轻人写他们自己。

王毅18岁当兵,从战士、班长、护士,到干事、基层副教导员、报社副主任、出版社主

任、副总编,一刻也不曾离开熟悉的军队,又深深地热爱着军队,丈夫曾是部队的飞行员,儿子年纪轻轻又被她送进了部队。这一阅历,对于军旅作家是无可比拟的优势,有利于创作出军队的典型人物。

实话说,这些诗文我并没有完全读,有的读得又不大认真,即便如此,她一些作品还是引起了我的共鸣,她思想的尖利、触觉的敏锐,包括表达的独特,都让人很有感触。读这些作品我首先就会想,这是一个有生活的诗人的作品,她不能满足于眼观六路耳听八方,不满足于一般的观念和思索,一直试图掀开浮萍一样的生活表层去揭示真实和本质,这是当下非常难能可贵的,是一个作家应当恪守的本分。纵观整部作品,无论是小说、人物对话、评论,还是采写,大都围绕着军营生活、爱情和生命体验,她一边观察它们,描摹它们,同时也在探索它们之间生命本质的关系。说起来以上几点也都是文学创作中的常见题材,但王毅通过自己独特的视角,没有因循守旧或落入窠臼地进行表达,而是融入了自己的生命体验,用优雅且非常质朴直白的方式,令她的诗文闪烁一种独有的光泽和质地。

应当说,王毅的努力与成绩值得肯定,尤其是她身居闹市,工作业务繁忙,还能偏居一隅,静心来创作这么多佳作,其勤奋,令人赞赏。

女性视角下的战争

□周大新

王毅把新出版的作品《水玉小集》六卷送我,书中一篇《红装》让我眼睛一亮,问:红装是何意思? 答曰:不爱红妆爱武装。红,代表女性;装,代表武装。听罢觉得军事学术论文这样命名,有点意思。

战争让女人走开,这种流传甚广的老话,被王毅在这篇《红装》里推翻了。在她看来,在战争面前,女人从未走开过,也不可能走开。她从冷兵器时代的木兰替父从军、少女荀灌助父救城;讲到热兵器时代的毛泽东动员妇女参加革命,让女红军西征;再到新时期出现的女军事专家、女飞行员、女伞兵、女陆战队员、女舰员、女师长等等巾帼英雄,驳斥了“战争让女人走开”的老观念。接着,从美国陆军妇女队伍的雅典娜女战神标志和世界名画《自由引导人民》入手,进一步论述女军人身上蕴藏的精神力量 and 她们参战后在男人身上激发出的能量,并从中得出结论:当一个民族的女人走上了战场,那这个民族将不可战胜。这种看法我很认同,战争起时,若女性们都上战场奋勇杀敌了,男性将士再不浴血奋战,那有何颜面去面对社会?

王毅在文中认为,女性走上战场的过程,其实也是不断自我解放的过程。女性挥刀提枪去战场上搏斗,既是为国尽忠,也是在显示自己的力量,从而挣脱男女不平等的束缚,把压在身上的皇权、族权、神权、父权等都摆脱掉,真正使自己获得解放。我觉得这种看法也有道理,当男人们看到女性在战场上不怕牺牲英勇杀敌的身影时,还有谁敢去轻视女人?不由自主地,尊敬和爱意会从男性心中生出来。

《红装》在对未来战争的样态进行分析后指出,未来的信息化战争会更需要女军人,那里会留给女军人一片更大的施展天地。王毅认为,未来战争与以往历史上的战

争相比,不论是在作战的空间上还是在作战的装备和方式上,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,这种新变化为女性参与战争提供了全新的机遇。尤其是武器装备发生了质的变化,智能因素成为战斗力生成的主要构件,对战斗人员体力的依赖性减少,对性别的要求越来越低,这就为女性参与战争提供了更大的可能性。我觉得这种分析很有见地,目前世界上的很多国家都在增加军队中女性成员的比例,这应该是为王毅的这种分析添加了佐证。

在这篇文章的最后,王毅从思想观念再解放、环境再解放、人才制度再解放、女军人自身再解放四个方面论述未来战争中女军人成长发展的路径。企望军队从战略高度来重视对女性人才的吸收、培养和使用,用相同的标准一视同仁地对待女干部,匡正选人用人风气,构建有利于女性人才成长的制度体系,努力推动军队人才队伍建设整体水平的跃升。我感到这些想法都非常好,是一个女军人对国家大事慎重思考后得来的成果。如今,社会上有一种看法,认为时下的年轻女性们想得最多的是美容美发美体事宜,思考得最多的是拥有何种手袋、衣饰和化妆品,王毅的这篇文章在一定程度上颠覆了这种看法,让我们知道,还有许多如王毅这样的女军人,自尊自强,不甘男军人之后,她们既爱红妆,也在思考一些有关军队建设和国家、民族未来的大事。

王毅在军事文学领域,已展现过她的才华,如今又在军事学术研究领域里努力,写出了这篇有见地有思考深度的文章,让人为她高兴。《红装》在写作上用了一些文学语言,使其与一般的学术文章有了区别,读起来分外生动,让人一拿起就忍不住要读完。这说明搞文学创作的人去搞学术研究,也自有优势。

直抵人心

□刘丽群

“大事”,都是用极简的语言来表达。军旅诗人刘立云说:“我是一名军人”,“我希望我的诗歌发出剑的光芒”、“写诗的人和他的诗,就像怀剑的人和他的剑,这是一个事物的两种呈现;诗人钟情于他的诗,就像剑客钟情于他身怀的剑。剑怀得越深,越具有灵性,它会自己行走,自己在剑鞘里鸣嚶和颤动”。这一观点也正如军旅诗人简宁所说:“诗写出来之后,会自己走路,会自己生病,因为它们同人生活在世界上一样,也有自己的命运。不管别人怎么看。”王毅就是这样,执著地前行着。

“站在一个士兵的位置思考战争、思考人在战争中的命运,成了我无法回避的写作主题”,刘立云如是说,这也正是王毅追求的主题,因为他们同为军旅诗人,所以,“用诗歌来抒写和思考战争,比其他文体更感到得心应手,显示出这种文体的难以替代的尖锐性和抚慰性”,军旅诗歌都是激昂向上的,正如王毅在《仰望党旗》中所写的:“她用肺腑的真诚仰望,用深情的崇敬仰望,仰望一个民族智慧的精华,仰望一个国

另一种生活的书写

□谢有顺

对于当代文学,我有一个看法,觉得这些年来,尖刻的、黑暗的、心狠手辣的写作太多了,很难看到一种宽大、温暖并带着希望的写作。作家们不再有信心肯定什么,似乎也没能力把一种美与善写得真实、可信——可以说,这也是20世纪以来世界文学的常态。但一个写作者,如果只看到生活的阴暗面,只挖掘人的欲望和隐私,而不能以公正的眼光对待人、对待历史,并试图在理解中出示自己的同情心,他的灵魂视野终归是残缺的。因为没有整全的历史感,不懂得以宽大的眼界看世界,作家的精神就很容易陷于褊狭、执拗,难有温润之心。

这令我想起钱穆先生在《国史大纲》一书的开头,劝告我们要对本国的历史略有所知,“所谓对其本国已往历史略有所知者,尤必附随一种对本国已往历史之温情与敬意”,“所谓对其本国已往历史有一种温情与敬意者,至少不会对其本国已往历史抱一种偏激的虚无主义……而将我们当身种种罪恶与弱点,一切诿卸于古人”。钱穆所提倡的对历史要持一种“温情与敬意”的态度,也是他研究历史的一片苦心。文学写作也应如此。作家对生活既要描绘、批判,也要怀有温情和敬意,这样才能获得公正理解人和世界的立场。可是,“偏激的虚无主义”在作家那里一直大有市场,所以,很多作家把现代生活普遍简化为欲望的场景,或者在写作中单一地描写精神的屈服感,无法写出一种让人性得以站立起来的力量,写作的路子就越走越窄,灵魂的面貌也越来越阴沉,慢慢的,文学就失去了影响人心的正面力量。

一种灵魂视野的残缺,很容易使作家沉迷于自己的一己之私,而无法在作品中出示更广阔的人生、更高的想象。而在我看来,好的文学作品,不仅要写人世,它还要写人世里有天道,有高远的心灵,有渴望实现的希望和梦想。有了这些,人世才堪称是可珍重的人世。中国当代小说惯于写黑暗的心,写欲望的景观,写速朽的物质快乐,惟独写不出那种可珍重的人世,因为在很多作家的视野里,人世已无多少值得珍重的事物了。他们可以把恶写得尖锐,把黑暗写得惊心动魄,把欲望写得炽热而狂放,却很难写出一颗善的、温暖的、充满力量的心灵。至少,这一类型的写作,不再受到作家们的重视。

这几年,陆续读到军旅作家水玉(王毅)的不少文字,却是与这种写作潮流相向而行的。我认识水玉有十几年了,每次见她,都能感受到她对时代的热爱,对生活那份炽热的感情。她喜欢自己的工作,欣赏身边的人,积攒那些温暖的碎片,愿意用手中的笔书写自己喜欢、敬佩的人与事。她是一个有自己精神世界的人,在这个世界中,仿佛不会被文坛喧嚣所影响,独自发声,独自前行。《水玉小集》共6卷,收录了她的各类文字,读之当然不乏有无奈、简单、过分直白的地方,但我依然能从中感受到一个作家的情怀,一个“兵者”的简念。

我认真读了其中《温暖》《兵者》两卷,它也许最能见出水玉的写作旨趣。她的小说、诗歌、散文所呈现的,说到底,就是另一种生活,一种过去在别的作家笔下不太看得到的生活——温暖、坚韧并带着希望的生活。正如她的书名所示,这种生活的底色就是“温暖”二字。无论是“出土文物似的”男中尉(《女兵班的男中尉》)、“渴望上舞台”的李小书(《爱人河》),还是有着一双“坚贞的目光”的刘医生(《精神病人》),都不屈服于生活的惯性力量,他们总是在尽力地改变生活、影响别人,身上也一直闪烁着人性的亮光。事实上,在水玉笔下,那些军营中的生活、军营里的人,身上都有这亮光,都在以自己的温度来润泽世界。这些温暖的碎片,被水玉收集起来之后,让我看到了这个世界的另一面。以前,我也想象过,这温暖的一面应该是存在的,只是觉得它太过渺茫、虚妄,相比,自己更愿意相信悲观与绝望的力量,似乎它才是这个世界的本质,但水玉用自己的写作向我们证明,这个世界还有另一种生活,另一种人,还有另一种温暖而柔韧的力量存在。

对于这种生活和这种人,我愿意选择相信。相信让我释然,相信也让我重新获得一种肯定的力量。水玉为何能在自己的文字里歌咏,我想,也是因为有了这种相信,进而才去肯定那些人人性中闪烁的亮光。尽管她写的很多都是平常的情,平常的事,可没有发现的眼睛,平常的情与事下面所隐藏的光辉就永远不会照耀出来。水玉看重这些常情、常事,甚至在这些人、情、事面前,她会变得异常简单,她的观察、热爱、崇敬,毫不掩饰,她迫不及待她想表达。就像她的诗歌,很多都是直抒胸臆的,但理解了她们之后,你也会受感于她的直接——她太想说出一一种真实的感受了。“让生命因痛苦而增大/让生命因成长而高尚/让生命因拥抱而常青”(《那一刻,我无法想你》),我相信,这就是水玉那一刻迫切想要表达的,因为她真实体验到了一种生命的伟大——汶川大地震中那些生命的传奇、感人的救援,似乎也不需要过多的文学装饰,记住就意味着一切。正因为水玉身上有着一个军人的爽直和情意,所以她总是站在正直、善良、温暖和希望这一边,她要为另一种生活,特别是一般人所未必知道的军旅生活立传,她要积攒下那些她见闻到的美好生活的片段,她要为这个世界写下一份浓厚的情意。

“一身新绿踏遍千山万水/流程中不可言传的气息/久久低回”(《世纪的苏醒》)。确实,《温暖》和《兵者》都是这种生命的低回,有人心的呢喃,也有高亢的歌唱,它是一个军旅作家为这个时代写下的一份人生见证,也是作者水玉怀着信念的一种表达。读她的文字,总会让人想到那些远方的人,那些坚韧的面影,并且不自觉地让人相信,这个世界存在另一种生活,在这种生活里,还有另一种人生;而有了这种生活和人生,现状是可以改变的,世界也终归是有希望的。

几年前,王毅在国防大学学习期间,就采访过我。我对她比较了解,很勤奋,很敏锐,有禀赋,作品也不少,经常拿一些发表的文章给我看。这次把作品结集出版,首先表示祝贺。

谈到出书,我们就谈书的价值,作家的价值。

作家的价值追求对于作品来说,至关重要,甚至是决定性的。作家有什么样的价值追求,其作品就有什么样的品位。

在当今社会利益格局深刻调整、思想观念深刻变化、价值追求多元化的形势下,我们作家需要什么样的价值追求呢?这是每一个作家首先要解决的问题。

70多年前,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,毛主席提出我们的文学艺术都是为人民大众的。70多年后,习近平主席同样强调,社会主义文艺,从本质上讲,就是人民的文艺。

这两个讲话都从根本上为作家指明了价值追求。离开了为人民创作,所谓的作家就不会赢得人民群众的支持和喜爱。要当好一名作家,最重要的一条,就是坚持为人民服务的价值追求。

坚持为人民服务的价值追求,必须把人民作为创作的源头活水。否则,创作就是无源之水、无本之木。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,人民生活是一切文学艺术取之不尽、用之不竭的源泉。

作家要经常提醒自己把双脚踩在大地上,不要浮在半空中。作家只有把人民作为创作主体,真正走进人民心中,认真地精读生活这部大书,才能从人民的实践和生活中汲取营养,作品才能有生活的温度和质感。

这些年在创作道路上,王毅深深扎根于广大官兵之中,每一篇作品,都流淌着对普通官兵的情怀。短篇小说集《水花》、长篇小说《女军人雨莉》创作灵感都来自于作者10多年基层营连生活的经历,有对军营生活的深切感悟。2008年汶川抗震救灾,王毅那时是战旗报社记者、编辑室副主任,在第一时间积极投入到抗震救灾的热潮中,不到两个月时间完成了《英雄遍地》长篇诗集。

这让我想起上世纪80年代在老山前线,很多好作品都源于前线,我比较满意的几篇报告文学也与那场战争有关。聂荣臻元帅曾说,伟大的作品产生在斗争尖锐的地方,产生在前线,产生在碉堡附近。一个军人,最能体现其价值的是前线,一个军旅作家同样如此。不走到战士中间去,不走到前线去,整天窝在屋子里,很难想象能编出有价值的文字。

现在,时代在变,但作家深入生活、深入人民群众的创作道路不能变。这是当作家的一条规律、一条准则。

让我欣然为这本书写序的另一个原因是王毅的真诚。韩愈说,“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,欲正其心者,先诚其意”。纯正的思想、真诚的意念是干好事、干大事的基础,否则即便才高八斗、艺精六艺也不能为人所敬,赢得作家理所应当的尊严。以我所知,王毅平日不仅对自己从事的职业真诚,接人待物依然如此,尤其是对待基层官兵、边防官兵更是如此。据说有一次她到边防采访,得知一位战士想要一本理论书籍,但部队图书馆没有,当地的新华书店也买不到,王毅回到军区后连续几天跑书店,终于把书买到并寄到了战士手中。类似的事情不止一件,从中足见她的真诚之念。这本书也是如此,思想艺术高度如何每位读者都各有所见,但可以肯定地说她为此书奉献了自己的真诚,是心血之作。

作家还必须把人民作为审美的鉴赏家和评判者。作品行不行,关键看人民。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,也是艺术的创造者、鉴赏者和评判者,要把人民群众满意和喜爱作为评价作品的最高标准。作家只有树立这样的最高标准,认可这样的评判者,才能算得上坚持了为人民服务的价值追求,才有可能创作出人民喜爱的优秀作品。

把人民作为审美的鉴赏者和评判者,这就要求作家必须深入地了解人民群众的审美需求,学习群众身上的艺术元素,从群众中汲取营养精华,从群众的语言中提炼艺术的语言,向民间文艺学习创作手法和技巧。

只有这样,你的作品才能既具有深刻的主题内涵,又符合大众审美要求,为群众所传颂。白居易经常拿着新作给邻居老太太“审读”,才会有《长恨歌》《琵琶行》这样的千古绝唱。

这些年来,王毅诚心诚意做群众和官兵的小学生,虚心听取他们的意见和建议,其作品既体现时代进步要求的主旋律,又落落大方通俗易懂,必将受到广大读者喜爱。

作家的价值也许不在当下,但以人民为价值,人民总有一天会发现和肯定你的价值。

因为,你书写人民,人民书写历史。

家时空不朽的真理。漫漫长夜时,她是慈祥的母亲,用一种叫信念的东西,照亮你的灵魂你的整个生命。”

王毅的诗歌,有大气磅礴的气势,也有心语低喃的婉转,她对于生命的意义和生存方式的探寻,让她的诗歌充满了生命的张力。她在汶川大地震中看到诗歌的热潮再一次席卷并感染了中国,就在《汶川大地震中的诗歌救赎》一文中写道:“真情,为衰落的诗歌赋予了一种重生之力”;“如果不能用心去写、去临摹、去观照这个世界,如果不能赋予人们精神上的牵引力,诗歌只能是书房中用于装饰的假花,空有美丽形态,而无任何实质内容,自然,也绝不会如同汶川大地震中广为流行的诗歌一样,让人们尚未读罢便泪流满面”。

“总有一种力量让你泪流满面”,这也是王毅的心声,她认为,“如果诗歌不能观照人类共同的命运,不能观照生命之潮的起起落落,不能观照我们身边发生着的日新月异的变化,那么诗歌又有何用呢? 这也正如评论家谢有顺所言:如果文学都成了无关痛痒的窃窃私语,或者成了一种供人娱乐的肤浅读物,它不但不探究存在的可能性,甚至拒绝说出任何一种有痛感的经验,这样的文学还有什么力量可言?”她在追问:“中国诗歌需要一种直抵人心的力量,这个力量又在哪儿呢?”这个力量,至少在她的内心深处,支撑着她走过军旅诗歌的瓶颈和困境。

作家的价值追求

□金一南